

# 文化转场：翻译与观念的迁徙

## ——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国际研讨会综述

周小珊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文本与文化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室、法国阿尔多瓦大学阿尔多瓦孔子学院，于2023年3月16—18日，在法国主办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兼国际研讨会。此次活动分为三大主题：国际研讨会“文化转场：翻译与观念的迁徙”；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先生纪念圆桌会议“从西方修辞学到中国诗学：文心雕龙”；以“通向梦幻观念”为主题的郭成东雕塑展。会议由阿尔多瓦大学金丝燕教授、周小珊副教授主持，相继在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研究中心及跨文化研究室的报告厅、露白市“游泳池”艺术与工业博物馆、露白市当代艺术展厅举行。

这次讨论会三大主题之一的国际研讨会也是文化转场研究系列的第三次研讨会。作为前两次研讨会的延伸与拓展，本次研讨会主要议题也是文化转场。世界上的每个文明在每个时代都无法脱离文化转场的主题，而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场方式有相似，也有差异。东方与西方之间，或者西方国家之间在文学、艺术、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文化转场方式与结果，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与吸收，某位作家、某个作品的翻译与接受，外来思想的历史地位，某些地域的思想与哲学的发展或变革，都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问题。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上，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从翻译实践、案例研究出发，通过分析、对比、批评等方法，探讨文化转场中翻译与观念迁移之间的本质关联问题。

金丝燕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神思〉与〈物色〉的不可译性之译》，

分析她与汪德迈先生的《文心雕龙》法文译本的翻译方法，尤其是一些核心概念如“神思”“物色”的不同译法的选择。金丝燕教授先从“神思”二字的字源，指出“神”的本义是主宰万物的天神，而偏旁“示”字本身是一个会意字，上面两横代表天，下面三垂笔代表日月星之光。而由“脑”与“心”组合而成的“思”意味着天神的思想、超自然的思想。刘勰《文心雕龙》里“神思”的含义，可以从时空、声、色、胸臆、辞令、天人合一这六个层面去理解。金丝燕教授又通过统计“神”在《文心雕龙》出现的次数，分析“神”的重要性及其含义的多样性，以及庄子对刘勰“神思”的影响。“神”的多义，使其在翻译成法文的时候，困难重重，而含“神”的词，如“神明”“神理”“鬼神”，在法文译本中也出现了一词多译。金教授最后介绍她与汪德迈先生如何解析“物色”的多重含义，以选择最合适的法文翻译。《文心雕龙》翻译成法语，不是简单的词语对应，也不是将一种思想引入另一种语言，而是在深入理解特定字词的不同含义之后，在东西方相遇的时候，进行思想迁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无法翻译的东西传达什么？——〈诗经〉翻译心得》。马修教授以自己翻译《诗经》的经验出发，思考将中国文人文化之重的文学经典《诗经》翻译成法文时，传递给法国读者哪些内容，翻译时遇到的障碍以及不得不接受或可以接受的缺陷。将中国先秦文学翻译给法国当代读者，不仅任务艰巨，而且有可能错误传递原有的信息，因此必须思考以何种方式去翻译。《诗经》作为已知的最早文学作品，道德与美学相结合，翻译成法语绝非易事，甚至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空想。虽然明知不可能，也要硬译，强迫读者接受他们不熟悉的表达方式。翻译的障碍首先来自对意义捕捉的困难，两千多年来《诗经》词句的解释与评注是多样的、开放的；其次是独特的四言句式，一字一音节，四个音节为一组，很难在与中文相差甚远的欧洲语言节奏中去复现这种诗歌形式。另外拟声词代表的音色，展

现出古汉语与现代法语之间少有共鸣，翻译即背叛，只能通过硬译让今天的读者能够“听到”原文本的声音。中国宗教有自己的特点，西方一神论宗教中上帝的概念，在中国信仰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翻译时，也需要考虑选择适当的词汇，让读者理解中国人的信仰。虽然问题众多，《诗经》的译者接受挑战，通过折中的方法尽量尊重《诗经》这部伟大作品的节奏、音色、词义，让自己的注解译本对文化转场的贡献，高于翻译过程中意义与声音的丢失。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蒂穆尔·穆希丁（Timour Muhidine）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法国存在主义在土耳其：翻译、哲学概念、重读》。穆希丁副教授以土耳其为例，指出文化转场研究的源资料，可以是文学报刊、作家回忆录、记者回忆录，也可以是经常被遗忘的译者、出版人，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业以手工为主，因此留下了大量的手稿、通信、个人或家庭档案，这些不同的资料可以用于重现、研究翻译与出版的动向，以及接收国的思想态度。穆希丁副教授从上述源资料出发，考察法国存在主义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传入土耳其的情况，分析这个在法国流行的哲学思潮如何也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土耳其引进存在主义先从萨特开始，尔后迅速引进波伏娃和加缪。“存在主义”一词首先以音译的形式在土耳其出现，后来用土耳其语造新词意译。土耳其的作家、思想家、出版人大部分都有法国留学经历，精通法语，将法国知识分子置于中心位置，正是他们促使法国存在主义在土耳其迅速发展。另外法语也是思想与政治解放的语言，是代表现代化的语言。虽然与存在主义相关的信息大量涌入土耳其，但是传入的方式较多，且反差很大，因此可圈可点，存在主义的哲学面几乎被忽略。萨特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土耳其语，最受欢迎的是《文字生涯》。大批年轻的土耳其存在主义作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往法国留学工作，他们关心政治，渴望作为欧洲的年轻一代而存在。除了介入政治，他们也追求性解放，这些存在主义作家中间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作家，当然这些变化局限于土耳其的一些大城市。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米歇尔·西班牙（Michel Espagne）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翻译作品作为文学或学科的基础》。米歇尔·西班牙教授认为翻译是文化转场的基础。文学作品借助其译本得以在全世界流通，而译本的流通过程揭示出交流的趋势。翻译有能力创建文化，在宗教领域尤为明显，比如古代中国的玄奘、鸠摩罗什等人的佛教翻译，是中国佛教形成的基础，而在欧洲，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七十士译本”之后的圣哲罗姆（Saint-Jérôme）于公元400年左右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在西方，这个拉丁文译本直到20世纪都被当作《圣经》的权威译本。路德（Luther）1522年翻译的《圣经》创造出了德国当代文学语言。《圣经》经过翻译移植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种语言之后，民族方言发展成基准书面语。除了宗教领域，人文科学史也体现出翻译作品的奠基性价值。法国、德国的一些例子充分证明了翻译在创建艺术史、文学流派，哲学思想、人文科学甚至政治思想的决定性意义。温克尔曼（Winckelmann）被翻译成法语后，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一门新学科即艺术史的建立，也促成了一种美学即欧洲新古典主义的形成，以及影响了新人文主义的哲学导向。翻译对文学流派的奠基性作用，可以用以下几个例子印证：沃斯（Voss）翻译荷马，创造出新的德国诗歌语言；海涅（Heine）和霍夫曼（Hoffmann）的法文译本，或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德文译本，也起到了同样的构建作用。一个哲学思想的形成，往往与翻译有关，如法国19世纪的哲学思想与康德（Kant）作品的翻译密不可分。克罗伊策（Creuzer）、弗里德里希·迭斯（Friedrich Diez）和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的著作翻译成法语后，影响了法国人文科学的发展方向。政治思想也与翻译有着紧密的关系，如社会主义民主、共产主义通过把费尔巴哈（Feuerbach）和马克思（Marx）的作品翻译成法语后，影响了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刘曼博士的发言题目是《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字接受——以殷铎泽〈论中国文字〉手稿为例》。刘曼博

士先介绍龙伯克 (Lundbæk) 偶尔发现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 的《论中国文字》手稿, 将其翻译成英文的情况, 再以大量的例子, 详细分析殷铎泽在《论中国文字》一书中对六书的理解。殷铎泽介绍六书时的顺序和命名, 与《海篇》一致, 显然沿用了中国传统说法, 但是他在介绍六书各自的特点时所举的例子, 从传教士的角度出发, 发挥了个人的想象。他认为象形字属于图形, 以“日、月、目、儿、鸟”5个汉字为例, 注出拼音和拉丁语翻译, 使用楷书与篆书两种字体。会意字为意义的结合, 他没有采用《说文解字》的例子, 而是自己选择23个容易记忆的例子, 同样注出拼音和拉丁语翻译, 详细解释会意字的组合方式, 每个构字部件单独的意义, 如“信”由“人”与“言”构成。书中部分例子彰显出他的宗教观点, 比“盘”, 盘古为中国创世神, “盘”含“舟”, 他因此认为“盘”为“诺亚”的中文对应, 将汉字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联系起来, 得出基督教早就藏于汉字的结论。殷铎泽指出形声字在汉字中的主导地位, 对象形字作出两种阐释, 第一种即像许慎那样, 把形声字看作形旁与声旁的组合, 如“河”, 但他认为这种阐释过于平淡, 便借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形式与物质, 对形声字的造字法进行第二种阐释, 并举出9个例子。殷铎泽认为只有少数汉字属于指事、假借、转注, 因此只作了简单的介绍。《论中国文字》的价值也在于用大量例子如《易经》《伏羲氏龙书》《秘书神农作》等书体样式, 指出汉字字体的丰富性, 汉字数量庞大的原因, 以及达到中国文人的水平需要掌握的汉字数量。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玛丽昂·勒克莱尔 (Marion Leclair) 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接受中的他者: 威廉·戈德温 (William Godwin) 在法国、英国》。勒克莱尔副教授以戈德温的生平与著作、英法两国政治情况作为研究背景。戈德温起先是牧师, 后来放弃该职业, 到伦敦靠写作、翻译、做新闻谋生, 1793年出版《政治正义论》, 借着英国对法国大革命的极大热情而在英国文坛一举成名, 成为英国激进主义的领军人物, 并于次年出版他最知名的小说《事物本来面目或凯莱布·威廉斯

传奇》。同年英法开战，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压制政治激进运动，许多激进运动成员被捕，被控叛国，戈德温因为《政治正义论》售价过高、读者少、影响小而逃过一劫。但是他出庭参加被捕朋友的审判，并撰写批评文章帮助朋友无罪释放。他与名气比他更大的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生有一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科学怪人》的作者。激进运动在英国被镇压后，戈德温变得默默无闻。他开了一家书店兼出版社，专做儿童文学。勒克莱尔副教授先着重分析《政治正义论》的内容特点及其英国的接受情况，尔后是这本书在法国的不幸遭遇。戈德温将这本书寄到法国，贡斯当（Constant）的法语翻译相当自由，对原著改动删节较多，并因为贡斯当本人的政治思想变化和法国的政权更替，这个译本在他生前没有出版。相反，《凯莱布·威廉斯传奇》的两个法语译本在法国大受欢迎，并被改编成戏剧。戈德温经过法语翻译再回到英国，显得更加温和，政治色彩减弱，更容易被英国接受。1831年《凯莱布·威廉斯传奇》在英国再版，装订成一册，并配上插图。戈德温本人形象在英国的改变，在法国的影响，以及英国新的政治局势，使得这本小说成为英国文学经典。

南京大学张新木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心灵的间歇”之迁移：翻译普鲁斯特》。张新木教授的发言分为四大部分：《追忆似水年华》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对翻译的思考；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小说的理解；自己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经验。《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由译林出版社于1989—1991年间出版的七卷本，由15位译者合译，原则上是两位译者译一卷，其中一卷有三位译者，这个全译本后来译林出版社多次再版。《追忆似水年华》还有两个缩译本，一个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沈志明译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克希译本，译名改为《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之一徐和瑾，独自重译《追忆似水年华》，但只译出四卷。目前还有孔潜正在独自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全本。翻译《追忆似水年华》，首先要研究普鲁斯

特与其作品。“心灵的间歇”是普鲁斯特自己使用的一个特殊表达，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新感受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这就是“心灵的间隙”，是作者一直试图捕捉、升华的东西，全书就是对“心灵的间歇”的觉悟历程，因此翻译必须抓住这个“心灵的间隙”。这个“心灵的间隙”通过翻译迁移到译本中的时候，既要让读者能够读通，又要保留普鲁斯特的特色，比如对世界的看法，比如长句，比如隐喻，比如用词。译者应该注意两者的平衡。翻译应该从内容、形式与思维模式三个层次上保持对原文的忠实，一个好的译者也是作家、批评家，有写作和文学批评能力。张新木教授用具体的翻译例子，展示如何抓住普鲁斯特“心灵的间隙”，把握字句的含义，以及翻译中如何处理长句、隐喻、通感等问题。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周小珊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幻想科学之迁移：凡尔纳的中文翻译》。凡尔纳作为超前于他所处时代的作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享誉世界。虽然他的科幻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过时，但是制造核潜艇、征服太空等与科学相关的新闻，电影电视对他作品的改编，以及专家学者的论文，使他时不时地回到读者面前。凡尔纳的世界知名度也离不开翻译，作为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作家之一，凡尔纳正是靠翻译走向了世界。如果说凡尔纳是他那个年代对德国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个作家之一，那么中国发现凡尔纳相对较晚，但是中国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出发，立即从凡尔纳的小说中看到了传播科学的捷径。思想的转场常常是双向的，凡尔纳的小说创作中有诸多与中国相关的段落，如《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征服者罗比尔》《特派记者：篷巴拉克历险记》。以中国为背景的，写在拥有福楼拜、法朗士、马拉美等读者的朱迪特·戈蒂耶小说《帝龙》之后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充分展示了凡尔纳博览群书，并从当时与中国相关的各种文章中寻找灵感描绘出中国形象的严谨态度。中国对凡尔纳的翻译早于与他同时代的法国著名作家，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于20世纪初，始于薛绍徽与陈寿彭从英译本转译的

《八十日环游记》，这个译本与凡尔纳的原著出入较多，译者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移植进译文，直爽、勇敢的女主人公化身为谨慎卑微的女子。薛绍徽之后卢藉东、梁启超、包天笑、鲁迅等人也纷纷从日译本转译凡尔纳，并在翻译过程中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原文进行删减改动再创造。第一次翻译高潮于1915年结束，翻译的作品基本为冒险类题材，翻译质量也不尽人意，五四运动之后译者不再关注被贴上通俗小说家标签的凡尔纳。到1950年代，凡尔纳的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又受到重视，1956年至1961年间，凡尔纳的十几部小说分别有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凡尔纳从此被定为儿童科幻小说家，译文也以流畅易懂为标准，并配有插图。第三次翻译高潮出现在“文革”后，得益于政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政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8部凡尔纳小说中译本。凡尔纳对中国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小说出现了新的体裁。周小珊副教授通过文本对比，指出早期中国科幻小说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有明显地模仿《气球上的五星期》的痕迹，但在科学细节方面又有许多缺陷。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路易萨（Luisa Prudentino）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1930年代好莱坞模式向中国电影的迁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一个灰暗的时代，甲午战争失败后签署的《马关条约》，让中国撤出朝鲜、失去台湾，国际声望一落千丈，中国社会内部也动荡不安，农民背井离乡，涌向较为发达的几个大城市，城乡划分愈加明显。中国正是在这个混乱和不安定的背景下与电影相遇。1895年，第一部外国电影在上海放映，这部电影很可能是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人下班离开工厂的场景。中国完全空白的电影市场的巨大商机，吸引大批西方投机者前往上海。美国人带着美国胶片来中国碰运气，短暂停留离开中国时将剩余的胶片卖给中国人，中国电影一开始就从物质上依赖美国。早期的中国电影主要模仿美国电影，从中寻找灵感。路易莎副教授通过几个影片片段，如《劳工之爱情》中滚下楼梯的典型

好莱坞式滑稽镜头，指出美国电影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电影强国，称霸中国市场，尽管票价不菲，观众依然争相前往影院观看美国电影，美国喜剧演员如卓别林深受中国观众喜爱。但是美国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垄断，观众对西方的仰慕，催生了中国人的不满与不安情绪，中国电影应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一方面排斥美国电影的经济入侵，一方面又借用美国模式作为发展框架。她以黎民伟、罗民佑在“电影救国”理想指引下合办的联合影业公司为例，指出中国电影经济参照了好莱坞模式，首次由一家公司全权掌握电影的制作、发行、经营，并有自己的拍摄棚、导演与演员学校以及电影院，但从经济实力上还无法与好莱坞相比。联合影业公司拍摄出了高质量的影片，如史东山的《银汉双星》、卜万苍的《一剪梅》、袁牧之的《都市风光》《马路天使》。路易莎副教授通过对这几部电影的详细分析，指出它们既受到外国的影响，也结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中国电影特有的美学规约。

法国里昂三大杰奎琳·埃斯特兰（Jacqueline Estran）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1920—1930年代在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理性与情感》。莎士比亚无疑是中国最有名的西方戏剧家，埃斯特兰副教授回顾了莎士比亚引进中国的主要过程：1839年林则徐首次提及他的名字；1902年梁启超首创中文译名“莎士比亚”；1903年出现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故事集》节选中译本《海外奇谭》，译者不详；1904年林纾的文言译本同样出自《莎士比亚故事集》；他的作品20世纪初被改编搬上中国舞台；1920年徐志摩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1921年、1924年田汉分别翻译《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戏剧界与学术界合力推广、研究莎士比亚：1984年成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1986年举办首个莎士比亚艺术节，同时也组织了30个研讨会，莎士比亚的戏剧被改编成京剧、昆曲、黄梅戏、越剧及话剧。莎士比亚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交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翻译是最明显也是最复杂的。一群喜爱戏剧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于1925年、1926年发起

国剧运动，作为《新月》（1928—1933）杂志的骨干，他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化转场功不可没。他们中的余上沅、梁实秋、邢鹏举、徐志摩、顾仲彝在20世纪20年代末通过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使莎士比亚在中国逐渐成名。他们在有限时间段的共同努力，使莎士比亚的作品最终全部被译成中文，而他们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则为莎士比亚转入中国文化提供了基础。

诗人与翻译家王以培的发言题目是《论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本来就存在，雕塑家只不过是发现了它，从石头中提炼出来，诗歌也一样。《恶之花》存在于不同的语言，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语言中寻找并发现奇异之花。王以培讲述了自己1986年在北大旁听金丝燕教授关于中国当代诗歌起源的课的时候，与波德莱尔相遇，从文学上与精神上对波德莱尔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王以培介绍了他翻译《秋歌》时，对隔行交互押韵ABAB的处理方式，如“colère”最初译成“愤怒”，但与“地狱”不押韵，于是将“愤怒”改成“战栗”，节奏与韵律优先于词义与语序，这样的处理方式在《女巨人》和《太阳》也可以见到。因为波德莱尔更加关注诗歌的韵律与音乐性，所以《恶之花》的译文必须押韵，如果能够遵守ABAB、ABBA的押韵格式则更好。翻译诗歌如音乐家演奏音乐，同一个曲谱可以有不同的演奏方法而不失精准，译者就是要根据自己对艺术的理解释放自己。要想翻译《恶之花》，译者应该在经受过种种痛苦、凌辱、嘲讽之后依然不折不挠，才能真正走进作品，如翻译《黑暗》，不仅要认真体会波德莱尔的风格与情趣，也要体会诗人面对世界的痛苦的内心思想。翻译不是复印原作，而是模仿，是再创造，如毕加索模仿马奈《草地上的午餐》。《恶之花》的中译本中，最珍贵的当属才华诗人陈敬容、戴望舒和梁宗岱的译本，可以与原文媲美。在普鲁斯特看来，作家与翻译家面临同样的职责与任务，即展现生活的负面。王以培在翻译《恶之花》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翻译应该避免母语的固定表达、母语旧的形式和概念，创造出新的诗歌。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罗曼（Romain Lefebvre）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文翻译：分析与解释》。西夏于1038—1227年统治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与强大的宋、辽、金一直有接触。北宋六次赠《大藏经》给西夏。《大藏经》宋刻本《开宝藏》有几千卷，翻译成西夏文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是最早被引入中国的佛经之一。西夏社会由党项、汉人、吐蕃人、回鹘人组成，汉族文化与吐蕃文化不仅影响了西夏社会，也影响了西夏的文书。《大方广佛华严经》从5世纪到8世纪出现三种汉译本，其中80卷译本又称《八十华严》或《唐经》，它的译者包括实叉难陀、义净、法藏等，这些大师参与佛经翻译，对西夏人有着重要的意义。翻译工作持续了四年，《八十华严》以丰富的佛教内容、细腻流畅的风格、深邃的哲学思想，比另外两个译本流传更广。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正是以《八十华严》为原本的，虽然不能排除另外两个译本存在西夏文版的可能性，但世界上目前所存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均出自《八十华严》。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李仁孝，尤其注重发展文化与宗教，在这个背景下，再加上版刻、印刷技术的提高，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罗曼副教授介绍了西田龙雄（Tatsuo Nishida）的《西夏华严经》，指出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毛利瑟（Morisse）的《西夏文字与语言研究初探》。罗曼副教授以大量的实例，指出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以直译为主，音译较多，也有音译与意译结合，或意译，译者在西夏译文中对字的选择、增减，既考虑了佛教意义，也考虑到口语性。

意大利巴里大学乔瓦尼·多托利（Giovanni Dotoli）教授的发言题目是《21世纪的法语翻译》。他认为翻译是涵盖所有学科的“第八艺术”。曾经被包含在语言学里的翻译学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后，脱离语言学，反将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新途径，这应该归功于翻译界的重要人物，以及关于翻译的深度辩论。翻译不再是次要的、缺乏创新的，而是最高级的言语行为，应纳入诗学的轨道，翻译与原作有

着同样的文学价值。翻译不是逐字翻译。意义是双重的。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翻译的不是单独的字，而是文学气氛。多托利教授从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的《诗学——创作认识与翻译诗学》《翻译诗学》和安东尼奥·拉维里（Antonio Lavieri）的《翻译美学与诗学》出发，取“诗学”“美学”，再加上“节奏”，指出这三个词就是21世纪翻译最根本的研究方向，从“结构、符号”唯科学主义去理解诗歌的意义，是荒谬的。亨利·梅肖尼克为翻译研究的未来敞开了大门，他的诗学思想将是新世纪的主轴。如何去判断一个翻译是好的翻译还是差的翻译？亨利·梅肖尼克从本雅明（Benjamin）那里得到了答案，即诗学思想改变诗歌，正如数学思想改变数学，这就是应该翻译的东西，也是体现一个思想的现代性的东西。多托利教授也指出双语词典翻译的重要性，在字典里寻找一个词的含义本身就是一种诗歌行为。翻译研究当然也要考虑新的技术以及机器翻译，虽然译者基本都在用电脑做翻译，但是机器翻译不是诗学翻译，不可能进行文学翻译，但至少引起了全世界对翻译的讨论。

研讨会最后的圆桌会议，从重温汪德迈先生文化转场视角的录像开始，学习汪先生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及他跨学科、跨文化、跨时空的综合视野。汪先生讲到西方与中国在逻辑学与文学上大为不同，西方发展逻辑学，而逻辑学在中国是次要的。《文心雕龙》里的“雕”是关键，将《文心雕龙》介绍到法国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两者相遇而不产生矛盾。《文心雕龙》成书于5世纪，思想内容深奥，因此在法译版的序言里采取法国读者熟悉的问答形式，帮助读者理解。这些问答内容包括：什么是《文心雕龙》；文的多重含义；《文心雕龙》的结构；道是宇宙思想，而礼为其基础；《文心雕龙》中的佛学启发；今天为什么要读《文心雕龙》？怎么读《文心雕龙》？金丝燕教授介绍了与汪先生在巴黎书桌（Ecritoire）咖啡馆工作的情况，分享中国逐步出版汪先生著作的照片。最后与会者就“文化转场何以可能？各方在文化转场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的主题，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交流了对

艺术、文字、文学、思想转场的看法。金丝燕教授总结指出，文化转场研究应该覆盖最大的研究时间段、最宽大的研究空间，另外还涉及态度问题，是接受还是忍受？接受就会有选择，态度就是积极的；而忍受则是被迫反应，是一个被动的、愤怒的反应。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以“通向梦幻观念”为主题的郭成东雕塑展在露白市当代艺术展厅正式开幕，雕塑家郭成东致开幕词后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观众除了可以欣赏郭成东的重要作品之外，还可以通过纪录片，了解郭成东的工作室，以及每件作品的创作灵感与理念。